

烽火弦歌：抗战时期的考古志业与精神

卢莹 裴世东

202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80 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危难中，初生的中国考古学发展举步维艰。面对时局，考古工作者秉持“考古报国”的决心，在战火中坚持田野调查、发掘和学术研究，融入“文化抗战”的史诗篇章。

战时田野发掘与学术成就

1921 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拉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此后李济主持发掘的西阴村遗址和以宁夏水洞沟遗址发掘、周口店“中国猿人北京种”的确立为代表的史前考古发现，初步确立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领域的重要地位。1928 年，“中研院”史语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主持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开展的首次考古发掘，殷墟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早期发展的核心奠基地载入史册。1931 年梁思永在殷墟第四次发掘中，对后岗“三叠层”的确认奠定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基础，与苏秉琦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共同构成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的脊梁。也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初露峥嵘的中国考古在内忧外患中惨淡经营，成为民国时期少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科之一。1937 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史语所”的殷墟田野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历程，先迁至长沙，后辗转昆明，最终立足李庄，考古学人在烽火不息的境遇中坚持田野考古与室内整理并济，延续中国考古学的新火。

全面抗战时期，有组织的田野发掘工作主要由新生代学者承担，既有吴金鼎、夏鼐、曾

昭燏、冯汉骥等欧美归来具备考古专业背景的留学生，也有“史语所”培养的石璋如等本土学者，他们掌握了高水平的田野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1938 年至 1944 年，“史语所”“中博物院”“营造学社”“中国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先后组织了“苍洱古迹考察团”“川康古迹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等考古调查发掘团队，对西南地区史前文化、四川汉代崖墓和甘青地区著名古代建筑、石刻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尤其是夏鼐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发掘从地层学上证明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对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排序的失误，并以考古实物证据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这些田野考古发掘成果追溯了中华文明源流，对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和凝聚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的考古材料室内整理研究工作成果卓著，取得了民国时期科学考古研究的最高成就。1938 年李济代理“史语所”所长一职，领导考古组对殷墟出土的陶器、铜器进行分类整理，并结合实验考古、统计学等方法编制了《殷墟陶器图录》和《殷墟陶器研究》，研究器物类型学演化关系；董作宾在高去寻等人协助下继续整理殷墟甲骨，运用现代天文学知识研究殷商历法，其代表作《殷历谱》于 1945 年 4 月在李庄板栗坳完成并出版；劳幹整理居延汉简后完成的《居延汉简考释》是汉代简牍研究的杰出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群体，利用考古材料形成了重要成果，如郭沫若、尹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考古材料，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和阶段，出版了《青铜时代》《中国原始社会》等著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研究路径。室

内整理研究工作成果的出版和发布，从学术层面夯实中国文化基因的源远流长和一脉相承。

全面抗战迫使大量文教机构撤到西南后方，学术研究机构因地制宜，利用富集的边疆地区民族志材料开展民族考古调查和人类学调查。“史语所”“华西边疆研究会”等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人类学调查视为重要工作。迁至昆明时，“天工学社”曾对龙头村的农业社会组织和生活进行详细的调查，并与营造学社合作开展研究。石璋如还曾远赴晋绥，在颠沛流离中完成《晋绥纪行》。迁居李庄期间，凌纯声、芮逸夫等学者完成诸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民族学巨著，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认知的提升提供民族志证据。此外“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和“大足石刻考察团”的调查也成为边疆地区美术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抗战时期内迁的学术机构，囿于时局和经费等限制，多采取学术合作的方式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一步发展，近代科学考古学方法完全确立。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既是乡野书斋里的资料整理，也是兵燹之厄中的田野发掘，更是文明存亡之际的生死博弈，全面抗战时期的考古工作不仅填补了区域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空白，还因在极端环境下坚持学术探索而成为战时科学精神的象征。

战时民族精神与文化遗产

抗日战争史不仅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争史，更是一部文化存续与民族精神觉醒的史诗。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以文化为武器，掀起“文化抗战”的浪潮。“考古抗战”是“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

人立“学术报国”之志，通过考古发掘、文物抢救、边疆探索、学术写作、文化互鉴等方式，借此保存文化血脉，凝聚民族精神，坚定抗战决心，并最终服务于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大局。

学术即国器，赓续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抗战时期的学术报国，是民族精神的集体觉醒。1937 年“史语所”迁长沙，梁思永在日军轰炸下坚持考古调查，西迁途中抱病坚持整理殷墟考古资料，考古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化为照亮文化传承的灯塔。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坚守也引领着新一代考古学人，吴金鼎、夏鼐、石璋如等在西南、西北边疆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实践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使命，在艰难困厄中实现田野考古成果的历史性突破。身居李庄的考古学人于橐驼坑堑中坚守学术志业，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精神培育紧密结合，他们以“书斋考古”的特有方式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学术成果，将“用考古对抗侵略”的文化信念铸成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强大动力。

文物即国脉，弘扬文化守护的使命精神。1937 年北平和上海沦陷后，为避免珍贵的文物、图书、档案沦入敌手，国民政府将暂存南京的故宫文物西迁疏散。“史语所”亦将图书、档案及发掘出土的器物转移至大后方。战时应急疏散时期，“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始终与文物共存，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 and 使命担当。在各界人士襄助下，文物西迁克服了敌袭、匪患、路阻等重重困难，安全转移并妥善保存。“史语所”在战后迁返时，保存了从南京带出的千余箱图书、仪器、档案及本所开办以来收集到的数百箱原始资料，为中华文脉的保存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文物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保护文物就是守护民族魂。而抗战时期文物守护的使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中迸发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考古人用生命诠释了“文明不灭，希望永存”的真理，凝聚中国力量，彰显抗战决心。

各族齐聚力，铸牢多元一体的团结精神。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注重发掘民族文化的地方特色，在多元文化差异共存基础上努力促成国家认同、民族交融。以文物整理、著述、边疆考古活动等形式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褒扬民族团结，从理论和实践上诠释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抗战时期对边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帮助少数民族构建身份认同，实现学术反哺民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唤醒中华民族意识的作用，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关怀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弘扬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为抗战胜利夯实广泛的文化根基。

全面抗战时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考古学人在颠沛流离中坚守学术志业，在磨盾之暇中开展考古发掘，考古事业在民族危难中呈现出“室内研究蓬勃发展，田野工作勉力延续”的勃勃生机，科学考古传统得以延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考古成果在构筑民族想象，重建民族信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考古学人在荒野之中上下求索，为文脉存续而战的精神成为全面抗战时期“文化抗战”的中流砥柱。在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之际，回望这段历史，激励着新时代的考古学人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不懈奋斗。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安徽考古学史”（AHSKZD2021D04）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

武王墩一号墓核心空间结构设计特点初探

施蓉蓉 宫希成 周学鹰

楚系墓葬的椁室研究以往多基于礼制视角，探讨其规模、分室数量、用材规格等与墓主身份等级之间的关系。相较之下，学界对于椁室形制与设计本身的探究虽有一定基础，但仍显不足。郭德维结合文献提出，“椁室的形制可能依据当时的房屋(官室)建造形制，即把房屋(官室)之制，移到建造墓葬方面来。”宋公文与张君则根据不同分室数量，归纳了对应的椁室形制特征。王从礼将楚墓划分分等级，进而分级论述各级棺椁的形制与建造方式。黄敬刚则从礼乐制度切入，分析曾侯乙墓椁室形制，认为墓主尚乐崇礼，曲尺形主体椁室与曲尺形曾侯乙编钟横梁有很大联系，主体椁室设计呼应“曲悬”礼乐思想，亦是墓主生前地面官室的缩影等。这些研究，均为理解椁室形制提供了多维启

发。然而，关于椁室内部复杂空间结构的设计理念与建造程序等，及其与当时礼制思想、宇宙观等之间的内在关系，仍有待深入厘清。

鉴于此，我们聚焦武王墩一号墓椁室的核心空间结构，力图从营造技术与工序的微观层面展开研究，揭示其空间布局与结构设计背后的技术与思想。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是我国近年来发掘的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楚国最高等级陵墓，年代属战国晚期。该墓椁室分九间，空间构造独特，从平面形制观察，椁室外轮廓呈“亚”字形。现存楚系墓葬中，椁室结构保存较完整的“亚”字形者不多，例如，湖北随州文峰塔 M18、河南新蔡葛陵 M1001 等，其椁室内部结构均呈轴对称。对比来看，武王墩一号墓椁室内部结构则非轴对称布局。其平面空间布局特征为：北室、南室面积相近且较大，东室、西室面积相近且较小、整体可视以为中室为中

心，各方向“日”字形边室按顺时针旋转四次形成的完整平面布局。（图1）

武王墩一号墓的中室椁墙分内、中、外三重，四向椁室椁墙分内、外两重。中室的外椁墙与四边室共用，外椁内垒砌两重椁墙。该墓椁墙的连接，主要采用宽槽接合的方式。其具体工艺是：在待接合零件上开出一条凹槽，然后将接合零件的一端（接合端头仅经削平处理）接入槽内。其中，外椁中心的“ㄣ”形结构与四向边室的连接采用三段式宽槽接合的方式，中心结构端部开半个槽口；四向边室则通过相邻两室相交的两椁墙，在交接处拼合出一个榫端和另一半槽口，三者拼合形成完整的椁室结构（图2）。这种由中心结构的半个槽口、水平邻室的另一半槽口、垂直置入的端头等共同完成的三段式拼合，在节点处形成稳固的“T”字形结构。外椁结构通过这些连接节点的榫卯之间的互锁，构成了整体抗侧力体系。

进一步解析外椁的平面结构，可以发现中心“ㄣ”形结构是一个稳定且独立的核心框架。因此，其外椁框架的建造顺序应是：首先构建核心“ㄣ”形结构，再通过宽槽接合方式与边室连接。尽管无法通过榫卯连接本身直接确定中心结构与边室连接的精确步骤，但依据其接合方式可以推测：建造时应是先将中心结构与边室椁墙拼合形成完整凹槽，随后沿平面垂直方向置入椁墙的端头。在此基础上，再筑边室中间的隔墙，最后置入边室外侧开有两宽槽的椁墙，形成外椁整体框架。据此，外椁平面空间设计始于中心的“ㄣ”形结构；再拼合四边室形成五室格局（中心一室+四边室）；接着将每个四边室从中间分隔，形成八边室；最终完成九室外椁的构筑。

至于内椁，其构筑应是在外椁营造完成的九室空间基础上进行的。其做法是向内围合，在外椁内部另外构筑起独立的九室空间结构（图3）。此外，外椁通过构建每边出头的“ㄣ”形复合椁室，并以此为核心向四向延伸排列榫木，通过榫卯连接构成“井”字网格状体系。这种设计既分隔椁室空间，同时也构成了可以分散棺室荷载的关键支撑结构。

此外，从平面尺度来看，外椁中心的“ㄣ”形结构围合形成了中室空间，中室内空长宽应是依据外棺大小等比放大的。组成“ㄣ”形结构的四根方木的长度不同，南北向约 6.9 米，东西向约 5.8 米，这与四向边室平面面积（南、北室较大，东、西室较小）相对应。中心结构确定后，该结构的四向椁墙长度（不包括榫头），即作为四向边室“内空长度”（北室、南室的東西距离，东室、西室的南北距离）的尺度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四向边室的“内空宽度”（北室、南室的南北距离，东室、西室的東西距离）也与“ㄣ”形结构相关。“ㄣ”形结构主体呈长方形，其四边墙体各向外伸出一段距离。这段延伸墙体既是中心结构本身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相邻四向边室空间的一部分边界。中心结构各边墙体伸入相邻边室的长度分别是：西墙、东墙各约 1.1 米，北墙、南墙各约 1 米。此延伸长度约占对应边室“内空宽度”的六分之一，其与所衔接椁墙的长度比例约为 1:5。但是也存在一定的误差，例如，中心结构南墙的延伸部分偏短，导致西室的南墙整体较其北墙偏短，在平面图上形成上（北）下（南）小的布局。

另外，在楚墓中椁室中心结构呈“ㄣ”形，还多见于分五室的设置。即在椁室空间中分隔出居中的棺室或内椁室，外加东、西、南、北四边室，形成“回”形椁室结构。例如，湖北荆门包山 M2、湖

北荆门严仓 M1、湖北枣阳九连墩 M1 和 M2、安徽长丰杨公 M9、湖南临澧 979M1 等。因此，武王墩一号墓外椁特殊形制的构成，或为楚墓中“回”形椁室形制经结构性调整后的进阶形态。

有趣的是，同为“亚”字形高等级楚墓的河南新蔡葛陵楚墓 M1001，其椁室结构同样彰显出以核心空间为基准的营造理念。葛陵楚墓墓主为平夜君成，年代约为公元前 377 年，属战国中期早段。该墓分内、外椁两部分，外椁的榫卯连接可明确其先后营建顺序：先构筑“ㄣ”形中心结构（东、西墙长 4.25 米，南、北墙长 4.15 米），再通过窄槽接合方式（与宽槽接合不同在于，窄槽接合的凹槽和端头都缩窄）与边室连接。其具体方法是：

首先，以其东、西墙长度作为东、西室内空宽度（南北距离）的尺度依据，向外拓展形成东室（宽 3 米）、西室（宽 2.5 米）。

其次，在此基础上以中心结构南、北墙长度作为南、北室内空长度（东西距离），拓展形成南室（宽 1.8 米）、北室（宽 1.6 米）。

最后，构成中室一东、西室一南、北室的构筑顺序。体现了以“ㄣ”形结构为核心，向外逐层拓展的空间营造逻辑（图4）。

葛陵楚墓由外椁隔板设隔所形成的内椁空间，也由“ㄣ”形结构所构成。但在营造程序上，该组合结构不同于外椁由内而外的空间延伸，而是既有中室的空间分隔。

武王墩一号墓与葛陵楚墓 M1001 二者的椁室形制设计，均是预先设定好“ㄣ”形与“ㄣ”形为核心结构；形成中室空间后，再由内而外营造形成边室，构筑好外椁框架；最后由外向内围合或分隔形成内椁空间。

与此同时，两座墓的核心结构具有共同特征：其长方形结构主体均延伸出一段墙体，直接构成相邻边室墙体的一部分。这种延伸设计有效分散中心结构与边室之间的连接节点，避免了多个节点集中在同一位置而导致的角部榫卯易受破坏而失稳的难题，提升了整体棺椁结构的稳固性（图5）。

综上所述，武王墩一号墓外椁独特的“ㄣ”形结构及其与边室三段式宽槽接合工艺，不仅代表了战国晚期木作技艺的高超水平，更清晰地展现了一种以预设核心框架为基准的空间设计方法。该模式通过确立稳定的核心结构，以其尺度为模数基准控制边室规模，并主导由内而外的空间拓展序列，实现复杂椁室体系的精密构建。其棺椁的营建，深刻体现了楚人对椁室空间层级、结构、秩序及其表征的思考与追求，彰显出楚国工匠的卓越技艺与精妙智慧。

（第一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第二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三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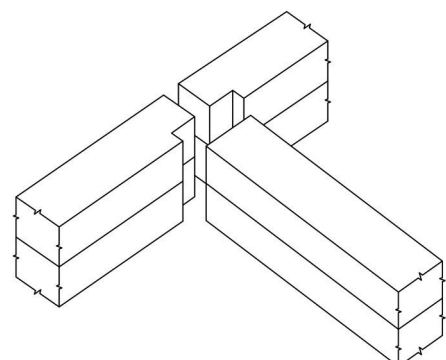


图2 外椁三段式宽槽接合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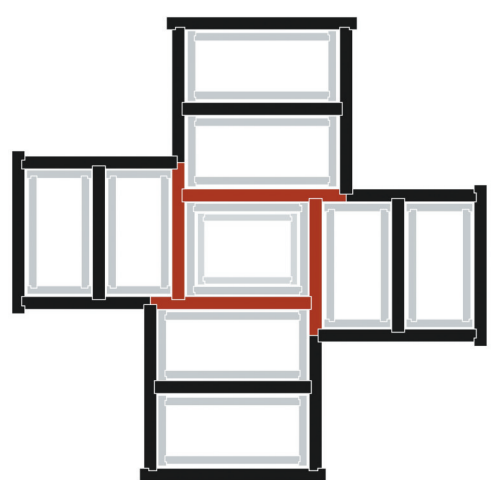


图3 武王墩一号墓结构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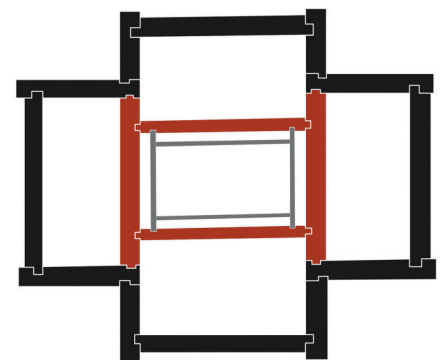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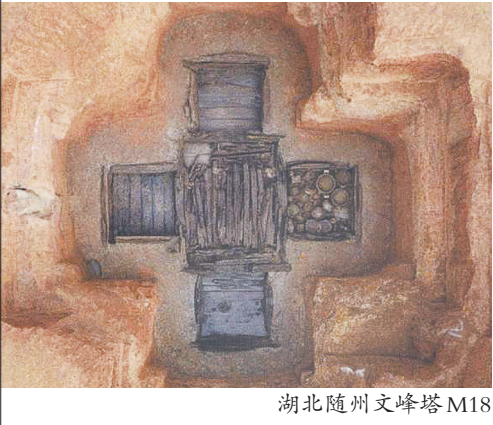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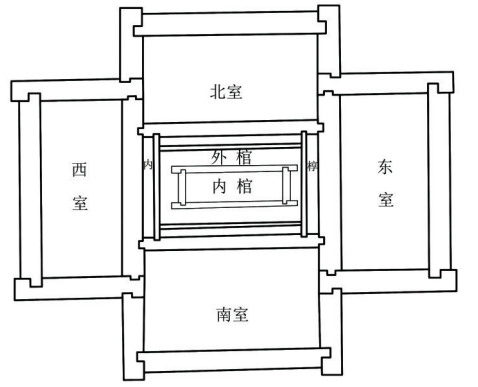
图4 葛陵楚墓 M1001 结构示意图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湖北随州文峰塔 M18



河南新蔡葛陵 M1001 (图片改绘)

图1 楚国“亚”字形大墓（方向均以上为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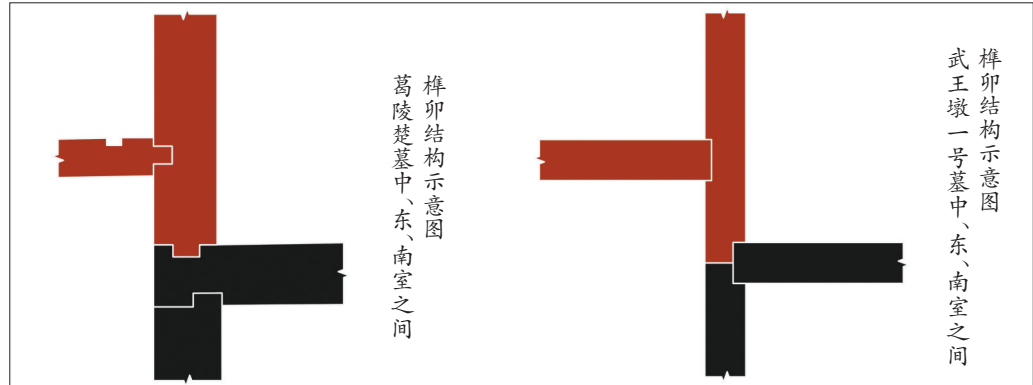


图5